

中共 湖南简史

1921—2000

王碧峰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共湖南简史

文选出版社

王碧峰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湖南简史/王碧峰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6

ISBN 7-5438-2612-7

I. 中... II. 王... III. 中国共产党 - 地方组织
- 史料 - 湖南省 IV. D23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038800 号

责任编辑: 李雄伟
彭富强
装帧设计: 尹文君

中共湖南简史

王碧峰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出版发行学校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375
字数: 401,000
ISBN7-5438-2612-7
K ·435 定价: 28.00 元

前　　言

中共湖南地方组织是 1921 年由毛泽东亲手创建的，至今已经走过整整 80 年的旅程。

80 年，在中华民族悠悠历史长河中仅仅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就在这挥手之间，三湘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个人间奇迹，是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领导团结湖南各族人民英勇奋斗的结果。

80 年来，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先是为着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英勇牺牲，排除万难，奋战 28 年，经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将湖南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继续领导和团结湖南各族人民，消灭残余敌人，安定社会秩序，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全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湖南，进行了大量且卓越成效的工作。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切实贯彻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全省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矫健的步伐胜利迈入

新的世纪。

诚然，中共湖南地方组织过来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创造举世为之震惊的人间奇迹，在其前进的征程中，也曾面对过许多棘手的难题，有过重大失误，遭受过严重挫折。但是，所有这些困难和挫折都没有阻挡她的前进，而只是使她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更加富有战斗力。

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完全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而作出的正确选择。完全可以相信，更加坚强更加成熟的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在今后的伟大征程中，一定能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实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和团结全省各族人民，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实现党确定的奋斗目标，将湖南以更加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在 80 年曲折发展历史进程中留下的经验是极为丰富的，是先驱者们在缺乏先例的艰巨条件下经过探索追求所得到的，是无数先烈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因而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因此，系统地总结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历史，深刻地揭示其革命与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对于指导当前的实践和思考今后的工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启迪作用。因此，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党的光辉历史，其中包括全面了解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历史，对于坚定人们对党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以史为鉴，指导实践，是十分必要的。

2001 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 80 周年，也是中共湖南地方组织

建立 80 周年。值此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将要来临的时候，作者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在主编《湖南省志·共产党志》的基础上，在中共湖南省委和省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下，编写了《中共湖南简史》，以此作为向党的生日献礼。本书在编写时，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注意正确把握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和实现地方党史与全国党史的有机结合，力求史料翔实、记述清晰、评议得当，比较系统而简要地反映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光辉历史。当然，要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湖南地方党史是很不容易的，这本书只能说是抛砖引玉。期望本书出版后，会引起广大读者和史学工作者的兴趣，使其不失为帮助读者了解和研究湖南省情，进行党史、党建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有一定价值的参阅资料，并且能有益于推动中共湖南地方党史这一课题的研究朝着更深的层次发展。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创建	(1)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夕的湖南	(1)
第二节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	(11)
第三节 创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	(20)
第四节 壮大革命力量	(30)
第五节 发展工人运动	(35)
第二章 在大革命洪流中	(42)
第一节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42)
第二节 反帝反军阀怒潮	(50)
第三节 支援北伐战争	(54)
第四节 大规模工农运动	(59)
第五节 大革命失败	(74)
第三章 掀起土地革命战争风暴	(84)
第一节 整顿和恢复党组织	(84)
第二节 组织武装起义	(93)

第三节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102)
第四节	坚持白区斗争	(116)
第五节	红军长征在湖南	(126)
第四章	动员全民抗战	(135)
第一节	恢复和发展党组织	(135)
第二节	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142)
第三节	组织抗日救亡	(149)
第四节	实现战略转变	(156)
第五节	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66)
第五章	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	(175)
第一节	恢复和发展党组织	(176)
第二节	开辟第二条战线	(180)
第三节	开展游击武装斗争	(192)
第四节	促成和平解放	(197)
第五节	解放湖南全境	(207)
第六章	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216)
第一节	加强党的建设	(216)
第二节	接管和建设政权	(228)
第三节	进行社会改革	(239)
第四节	实现三大改造	(251)
第五节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263)

第七章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273)
第一节	加强党的建设	(273)
第二节	学习毛泽东思想	(285)
第三节	三次整党整风运动	(294)
第四节	反右派、反右倾和社教运动	(303)
第五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313)
第六节	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324)
第八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	(334)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爆发	(334)
第二节	进行斗批改	(343)
第三节	整党整风运动	(352)
第四节	全面整顿及其反复	(364)
第五节	发展国民经济	(371)
第九章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381)
第一节	拨乱反正	(381)
第二节	整党和纠正不正之风	(398)
第三节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平息动乱	(412)
第四节	全面改革开放	(421)
第五节	大力发展国民经济	(433)
第十章	深化改革开放 胜利迈向新世纪	(443)

第一节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443)
第二节	深化改革开放	(461)
第三节	加大精神文明建设力度	(474)
第四节	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485)
第五节	继续维护社会安定	(493)
第六节	加速现代化建设	(499)
后记	(509)	

第一章 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创建

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五四运动中，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团结进步学生和爱国志士，在三湘大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1920年冬，在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1921年7月，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根据大会精神，于当年10月成立中共湖南支部。次年5月，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湘区委）。至1923年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湖南地方组织主要是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壮大革命力量，掀起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夕的湖南

五四运动前，湖南处于南北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势力相继入侵，社会动荡不安，经济严重衰退，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不断加深的境地，是军阀统治下最为黑暗最为腐败的时期之一。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封建军阀的残暴统治，必然加剧民族矛盾和阶级

矛盾的激化。因而至五四运动前夕，湖南的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成长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革命热情普遍高涨，一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严重抗争一触即发。

一 封建军阀残暴统治

辛亥革命失败后，全国各地军阀蜂起，彼此之间展开了无休止的争夺和混战。湖南地处南北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然成了军阀拼死争夺的地区。在数年间，湖南省级政权多次更迭，反动军阀频繁走马上任。辛亥革命长沙起义产生的革命政权仅存十余天，即因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遇害，革命果实落入军阀谭延闿之手。谭属立宪派，袁世凯不能容，故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即派其心腹爪牙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汤芗铭为人残暴，人称“汤屠夫”，袁世凯称帝失败后被赶出湖南。袁死汤逃，为争夺湖南地盘，南北军阀纠集重兵，大动干戈，湖南政权更是频繁更迭。1916年7月5日，黎元洪先是令陈宦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因各界反对，被迫改由握有实权的谭延闿接替。谭政治摇摆不定，国务总理段祺瑞不放心，于8月16日加派亲信傅良佐为湖南督军以分其权。谭对此极为不满，在交付督军印信后，托故离湘去沪，傅良佐遂保举周肇祥担任湖南省长。谭延闿旧部不满傅良佐的专横，南北两军再次开战，傅良佐兵败，被迫偕同周肇祥逃离长沙。11月16日，湘南护法军总司令程潜率部抵长，地方各界开会推他任湖南省长，但遭护法军湘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的反对，程潜被迫离开长沙，屯兵湘阴。谭浩明取消湖南省制，自以联军总司令名义兼摄湖南军民两政。此后数月，南北两军在湘北一带激战，谭浩明兵败走广西，程潜率部退驻耒阳。1918年3月，段祺瑞派张敬尧就职湖南督军兼省长。北军占领湘境大部分地区后，内部各派争相割据，吴佩孚占领衡阳，张敬尧盘踞长沙，冯玉祥管辖常德。此外，郴州、永兴一带为湘南护法军所治，湘西则有张学济、林德轩、田

应诏等人，自拥军队，自制县令，征收田赋厘金，各霸一方。五四运动前夕的湖南，实已陷入四分五裂之境地。

南北军阀无休止混战，政权频繁更迭，军阀势力无不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实行残暴统治，大肆掠夺，给湖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完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经济上，加紧对人民疯狂掠夺。这种掠夺突出表现在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税率不断增高。清朝末年，湖南全年财政收入为银元 1100 万元，而 1912 年至 1916 年增至平均每年为 1300 余万元，所增部分全为通过苛捐杂税搜刮民脂民膏所得。如田赋，1912 年全省为银 220 万两，1914 年为 250 余万两，继而增至 300 余万两。牙税，1916 年后的 3 年中，增加将近一倍。谭延闿统湘时，还通过频繁变换手法增加税收，掠夺人民。他颁布的《田赋新章》，将田赋由白银改征银元，规定按银一两折收银元 1.5 元。随后又增加田赋附加，附加部分相当于田赋正供两倍以上。1917 年，设田赋预征，提前征收田赋。滥发纸币更是各军阀掠夺人民的重要手段。以湖南银行发行的铜元票为例，1912 年发行 1100 万元，1918 年增加到 7100 余万元。因为滥发纸币，货币严重贬值，致使物价飞涨，商业凋敝，市场萧条。张敬尧督湘后，这种掠夺更为疯狂残酷。在谭浩明败退广西时，湖南银行本已被抢劫一空，张敬尧借口整顿金融，开办裕湘银行，大量发行“有奖惠民券”，将大量现金刮人私囊。大量增设苛捐杂税是张敬尧搜刮民财另一重要手段，他相继增加米捐、盐捐、铺捐，滥征厘金，浮取烟酒税，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在政治上，剥夺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实行残酷镇压。1912 年和 1914 年，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和《治安警察法》，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均列入政府行使治安警察权的范围，对人民群众滥加政治迫害，甚至任意拘捕和处判。汤芗铭更是大兴刑狱，广植特务侦探，刺探民隐，常以“面

带奸笑”、“不服盘诘”、“目无法纪”、“触犯军警尊严”等罪名，将革命党人乃至一般百姓拘捕入狱或杀害。张敬尧亦属残忍之徒，他所统军队仅在株醴一役，死人十万计，易家湾方圆 30 里人烟灭绝。在宝庆、新化、攸县、湘乡、浏阳、岳阳各县，亦是抢杀强夺，草木皆毁，丘里为墟。张敬尧有兄弟 4 人（其弟为敬舜、敬禹、敬汤），纵兵扰民，无恶不作，当时有一首民谣称：“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对张氏兄弟深恶痛绝。

在文化思想上，尊孔复古，摧残教育。1913 年，袁世凯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恢复祀孔典礼。1915 年，叶德辉在长沙成立经学会，大肆鼓吹尊孔读经。1918 年冬，吴佩孚在衡阳指使编撰《女史节要全书》，宣扬“三从四德”。张敬尧对文化教育的摧残尤为残暴，指令驻长部队强占学校作兵营，挤占校舍，妨碍校务，学生无法上课。湖南教育经费原每年为 80 万银元，本已见少，张敬尧竟将其中 30 万提作军费，留下部分又从中多方克扣，学校所得仅为十之三四，大批受津贴的学校数月不得分文，只得靠借贷度日。

南北军阀在湖南境内无休止的混战，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实行残暴统治和掠夺，给湖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宝庆兵灾纪实》曾写道：“岁余以来，南北五陷五复，往来十决十荡。战火所及，血肉横飞；戎马一经，闾里皆墟。商业凋残，士民流离，田园荒芜，学校蔓草。”这里所记虽为宝庆（邵阳）一地，其惨状实反映了三湘全况。

二 帝国主义入侵加深

湖南地处内陆，帝国主义侵入较沿海地区稍晚。自广州、汉口等都市开辟为商埠后，帝国主义魔爪开始直接伸进湖南。最先 是英帝国主义于 1899 年胁迫清政府开辟岳州（岳阳）为商埠，继而是 1904 年和 1905 年，英、日胁迫开辟长沙为商埠，湘潭、

常德为寄港地。英、日帝国主义入侵，湖南门户洞开，被一步一步地推向半殖民地深渊，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剧烈变化。

在五四运动前的数年中，帝国主义势力对湖南的掠夺是多方面的，就经济领域而言主要有三。一是利用不平等条约给予的海关税率的制定权和内地税特权，不受任何约束地向湖南大肆倾销纺织、香烟、食糖等日用消费品，廉价收购湖南的锑、铅、锌、锡等矿砂和粮食、茶叶、烟草等农副产品。它们还广设商业机构及其经销处、商店、货栈，形成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操纵着湖南的商品市场；二是湖南每年分担甲午战争赔款白银 30 万两和庚子赔款白银 70 万两以及其他赔款，全部是用关税和盐税作担保。加上汤芗铭向英、美借款 200 万，张敬尧向日本借款 500 万，湖南财政的主要来源关税和盐税大都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掠夺。日、英、美等在湘还开设多家银行，经营存、放、汇兑和金银买卖业务，对湖南的金融事业起着干扰和破坏作用；三是垄断湖南航运和矿砂销售。至 1919 年，英、日、美等国进出湖南的轮船达 4000 余艘计 37.3 万吨，在长沙、湘潭、衡阳、常德、岳阳等地均设有码头、趸船、仓库、代办所，而湖南自有的轮船吨位数却仅为外商的十分之一。列强还在湖南开矿办厂，采用杀鸡取卵的方法，滥挖乱采，破坏矿产资源。

帝国主义疯狂入侵，加之军阀政府苛索日甚，不仅造成人民大众日益穷困，湖南民族工业也遭受严重打击。首先表现在矿业由畸形发展走向急剧衰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湖南矿业在价格陡涨的刺激下，获得迅速发展。至 1916 年，全省新增各类矿场达 8000 家以上，矿工多达 16 万人以上（含季节性临时工），锑、铅、锌、钨、锰以及铁、黄金、铜、锡、石膏、硫磺等矿产品在全国均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锑、铅、锌、锰、砒、硫磺的产量为全国第一位。但是，欧战结束后，湖南矿业一落千丈，大批企业被迫停工，直至当时全省最大的华昌炼锑公司在内外联合夹

击之下也彻底破产。其次是轻纺工业从一度发展走向衰败。湖南惟一的近代机器棉纺企业湖南第一纱厂，由于日、美等帝国主义大量倾销纺织工业品，建成投产不几年即被迫停办。负有名气的浏阳夏布，出口量直线下降。瓷业、铸锅业、印染业、火柴业等也由盛转衰。第三，交通、邮电、电气、印刷等少数经济部门虽有所发展，但艰难缓进，而且因外人多方插手，受人抑制。

帝国主义列强在对湖南经济大举掠夺的同时，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侵略也日趋严重。至 1915 年，英、美、德、挪威等国在湘的传教士及其从事宗教活动者达 300 余人，另有一批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帝国主义分子也纷纷开办学校和医院。这些人大多是打着传教和发展科学文化的旗号，专门从事思想文化侵略和搜集情报、奴役民众的罪恶活动。创办湘雅医院专门学校的美国人胡美回美后所著《道一夙同》一书中曾写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公开承认了他们来湘开办文教卫生事业的真实目的。

三 人民大众日益贫困

湖南是个农业省，绝大多数人聚居在农村。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但并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反而促使地主阶级同高利贷资本进一步结合，加之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更加速了对农村土地的兼并和掠夺。因为农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大批依赖土地为生的农民，被迫变卖仅有的一点土地而沦为佃农、雇农。据北京政府农商部 1917 年、1919 年的统计，湖南佃农和半佃农在农村中约占 80%，其中佃农占 69.9%。而当时全国佃农和半佃农约在 50% 左右。

土地日趋集中后，地主、军阀、官僚、商人凭借封建土地所有制，采用多种手段对农民实行残酷剥削。首先是地租剥削大大加重。地租是封建土地制度下地主对农民经常而普遍采用的剥削形式，分为实物地租与货币地租，以实物地租为主。湖南的地租率在清末时一般为东家与佃户各半，五四运动前夕增加到东六佃

四，甚至东七佃三。由于单产有所增加及其他原因，地租剥削实际加重约 50%，有的更多一些。

除地租外，押金剥削亦有增加。湖南租种土地，佃户先要向地主交押金，如果佃户不能按时交纳地租，地主可从押金中扣除，并退田另佃。押金多少因时因地而异，一般相当于一年租谷，多的超过年产量的一倍以上，甚至接近田地的卖价。

在此期间，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亦不断加重。辛亥革命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大部分商人在农村中占有土地，造成了商人高利贷者和地主结合在一起剥削农民的严重局面。一是操纵农产品价格，扩大农产品的季节差价。他们趁农民秋收后需现金的机会，贱价收购稻谷，到来年青黄不接时再高价卖出。二是大秤进小秤出，用此手段掠取农民大量农产品。三是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放高利贷，以低价预购农产品，倒卖青苗。这是一种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相结合的剥削方式。四是趁农民生产生活急需现金使用的机会借款货物，几个月之后要借一还二甚至还三。

由于封建剥削的加剧，加上长年军阀混战，帝国主义残酷掠夺，广大农民衣食无着，更无力改善生产条件，结果造成水利失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严重削弱，导致耕田荒废，产量锐减，饥荒四起。1921 年，湖南全省有 30 余县大闹粮荒，饥民多达六七百万，饿死者 200 余万人。1922 年七八月间，湘资沅澧四水暴涨，倒溃堤垸 200 余处，滨湖 10 余县多成泽国，大批农民妻离子散，饿死者不计其数，惨不忍睹。

四 革命因素不断增长

封建军阀的残暴统治，帝国主义的疯狂侵入，必然加剧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辛亥革命失败后，一度沉浸在极度苦闷和彷徨之中的湖南人民产生了怀疑，革命因素不断增长，湖南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